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文獻整理論集

郭在貽 著 張涌泉 郭昊 編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文獻整理論集

郭在貽 著
張涌泉 郭 昊 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文獻整理論集 / 郭在貽著.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8. 10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柴劍虹, 張涌泉, 劉進寶主編)

ISBN 978-7-308-17782-5

I. ①敦… II. ①郭… III. ①敦煌學—文獻—研究
IV. ①K870.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03211 號

敦煌文獻整理論集

郭在貽 著 張涌泉 郭 昊 編

責任編輯 宋旭華 蔡 帆

責任校對 王榮鑫

封面設計 項夢怡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11.75

字 數 285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8-17782-5

定 價 39.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市場運營中心聯繫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總序

浙江，我國“自古繁華”的“東南形勝”之區，名聞遐邇的中國絲綢故鄉；敦煌，從漢武帝時張騫鑿空西域之後，便成為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會”。自唐代始，浙江又因絲綢經海上運輸日本，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之一。浙江與敦煌、浙江與絲綢之路因絲綢結緣，更由於近代一大批浙江學人對敦煌文化與絲綢之路的研究、傳播、弘揚而令學界矚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榮昌盛，學術底蘊深厚，在時代進步的大潮流中，涌現出衆多追求舊學新知、西學中用的“弄潮兒”。20世紀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流散而興起的“敦煌學”，成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中國學者首先“預流”者，即是浙江的羅振玉與王國維。兩位國學大師“導夫先路”，幾代浙江學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奮隨其後，薪火相傳，從趙萬里、姜亮夫、夏鼐、張其昀、常書鴻等前輩大家，到王仲華、潘絮茲、蔣禮鴻、王伯敏、常沙娜、樊錦詩、郭在貽、項楚、黃時鑒、施萍婷、齊陳駿、黃永武、朱雷等著名專家，再到徐文堪、柴劍虹、盧向前、吳麗娛、張涌泉、王勇、黃征、劉進寶、趙豐、王惠民、許建平以及馮培紅、余欣、竇懷永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學術追求，也有各自的學術傳承與治學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學科園地辛勤耕耘，為國際“顯學”敦煌學的發展與絲路文化的發揚光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浙江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者，成為國際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研究領域舉世矚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學術群體。這在近代中國的學術史上，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始創於 1897 年的浙江大學，不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淵藪，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英才輩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貫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腳踏實地而又敢於創新的學者專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的浙江學人而言，不僅相當一部分人的學習、工作與浙江大學關係緊密，而且每每成為浙江大學和全國乃至國外其他高校、研究機構連結之紐帶、橋梁。如姜亮夫教授創辦的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1983 年受教育部委託，即在全國率先舉辦敦煌學講習班，培養了一批敦煌學研究骨幹；本校三代學者對敦煌寫本語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獻的分類整理，在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浙江大學與敦煌研究院精誠合作，在運用當代信息技術為敦煌石窟藝術的鑒賞、保護、修復、研究及再創造上，不斷攻堅克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原語言文學分會基礎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也已經成為與甘肅敦煌學學會、新疆吐魯番學會鼎足而立的重要學術平臺。由浙大學者參與主編，同浙江圖書館、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編撰的《浙藏敦煌文獻》於 21 世紀伊始出版，則在國內散藏敦煌寫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領跑與促進的作用。浙江學者倡導的中日韓“書籍之路”研究，大大豐富了海上絲路的文化內涵，也拓展了絲路文化研究的視野。位於西子湖畔的中國絲綢博物

館，則因其獨特的絲綢文物考析及工藝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優勢，並以它與國內外衆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機構進行實質性合作取得的豐碩成果而享譽學界。

現在，我國正處於實施“一帶一路”偉大倡議的起步階段，加大研究、傳播絲綢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應有之義。這對於今天的浙江學人和浙江大學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學術積累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傳承、發揚學術優勢的問題，也是以更開闊的胸懷與長遠的眼光承擔的系統工程，而決非“應景”、“趕時髦”之舉。近期，浙江大學創建“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舉辦“絲路文明傳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邁出的堅實步伐。現在，浙江大學組織出版這一套學術書系，正是爲了珍惜與把握歷史機遇，更好地回顧浙江學人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歷程，奉獻資料，追本溯源，檢閱成果，總結經驗，推進交流，加強互鑒，認清歷史使命，展現燦爛前景。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編委會

2015年9月3日

出版說明

本書系所選輯的論著寫作時間跨度較長，涉及學科範圍較廣，引述歷史典籍版本較複雜，作者行文風格各異，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歷史、尊敬作者、遵循學術規範、倡導文化多元化的原則，經與浙江大學出版社協商，書系編委會對本書系的文字編輯加工處理特做以下說明：

一、因內容需要，書系中若干卷採用繁體字排印；簡體字各卷中某些引文為避免產生歧義或詮釋之必需，保留個別繁體字、異體字。

二、編輯在審讀加工中，只對原著中明確的訛誤錯漏做改動補正，對具有時代風貌、作者遣詞造句習慣等特徵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歷史地名、族名等稱呼，只要不存在原則性錯誤，一般不予改動。

三、對著作中引述的歷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處明確，核對無誤，原則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動。原著沒有注明版本出處的，根據學術規範要求請作者或選編者盡量予以補注。

四、對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魯番所出古寫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規範簡體字或繁體字，如因論述需要，也適當保留了

一些原寫本中的通假字、俗寫字、異體字、借字等。

五、對著作中涉及的書名、地名、敦煌吐魯番寫本編號、石窟名稱與序次、研究機構名稱及人名，原則上要求全卷統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體現時代特色或學術變遷的，可括注說明；無法做到全卷統一的則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書系編委會

目 錄

郭在貽先生與敦煌學	張涌泉(1)
唐代白話詩釋詞	(5)
王梵志詩校釋拾補	(15)
《王梵志詩校輯》誤校示例	(24)
敦煌寫本王梵志詩匯校	(31)
關於敦煌變文整理校勘中的幾個問題	(132)
敦煌變文校勘拾遺	(148)
敦煌變文校勘拾遺續補	(154)
蘇聯所藏押座文及說唱佛經故事五種校記	(163)
《敦煌變文集新書》校議	(172)
《伍子胥變文》補校	(200)
《敦煌變文集》底本選擇不當之一例(附校議)	(228)
敦煌變文詞語校釋	(237)
敦煌變文釋詞	(258)
變文校勘與俗字研究	(273)
讀新版《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293)
俗字研究與敦煌俗文學作品的校讀	(301)
俗字研究與古籍整理	(308)
唐詩與俗語詞	(320)
俗語詞研究概述	(339)
難忘導師情——懷念業師郭在貽先生	張涌泉(353)

郭在貽先生與敦煌學

張涌泉

郭在貽先生 1939 年 1 月 11 日出生於山東省鄒平縣碑樓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先後就讀於當地小學和張店市初級中學、濟南市第三中學，訥言敏行，沉靜好學，成績優秀，而尤以語文為最。1957 年至 1961 年就讀於浙江師範學院（1958 年改名為杭州大學）中文系。因成績優異，畢業後留校，分配在語言文學研究室，給姜亮夫先生當助手，至 1965 年秋季“四清”運動止。“文革”後調中文系任教。1979 年被評為講師，1980 年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85 年晉升為教授。1986 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為博士生導師。他是當時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1988 年，被國家人事部核准為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他是浙江省第六屆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社員，生前兼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委員會副會長、浙江省語言學會副會長。1989 年 1 月 10 日因病逝世，年僅 50 歲。

先生畢生致力於漢語言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文字學、訓詁學、楚辭學、敦煌學諸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大學畢業後，首先引起他興趣的是文字訓詁學，特別是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是他專攻的對象。他的處女作是 1978 年發表於《社會科學戰

線》上的《〈說文段注〉與漢語詞彙研究》等五篇系列研究論文。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對《說文段注》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文革”中，先生是“逍遙派”，他鑽進了歷代《楚辭》文獻中以躲避外界的紛擾。在研讀了數以百計的《楚辭》論著的基礎上，他憑着扎實的古漢語和古文獻方面的功底，精思博辯，寫成了《楚辭解詁》一文，對《楚辭》中的一些聚訟紛紜、向無定論的疑難詞語進行了類似破譯密碼的考釋工作，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還寫了《近七十年來的楚辭研究》《楚辭要籍述評》等論文，對《楚辭》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作了宏觀的評述，文章論述全面、評議得當，反映出一位深有造詣的研究者的真知灼見。

“文革”以後，在蔣禮鴻先生的影響熏陶下，他的學術研究從傳統的訓詁學領域轉向了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詞的研究，從此開始與敦煌學結緣。敦煌遺書的發現，改變了整個中國學術史的面貌，也為方俗語詞的研究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敦煌遺書中的變文、曲子詞、白話詩、券契等文書，保存着大量的口語資料，它們對於考察宋元白話之沿溯，對於近代漢語詞彙、語法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1959年，蔣禮鴻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考釋了一大批變文中的方俗語詞。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解決的問題仍復不少，而且蔣書只限於變文，考釋的範圍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和必要。所以在從傳統的文字訓詁學領域轉向俗語詞研究的同時，先生注意到了敦煌文獻中的俗文學作品，先後發表了《唐代白話詩釋詞》《王梵志詩校釋拾補》《敦煌變文校勘拾遺》《王梵志詩匯校》等一系列論文。在敦煌文獻方俗語詞考釋的過程中，先生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敦煌俗文學作品的作者或抄寫者，多數水平不高，寫本中字形訛誤很多，這些作品中豐富的方俗語詞往往是通過俗字別體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一些前輩學者在整理敦煌遺書的時候，還沒來得及對俗字、俗語詞給

予足够的注意，整理工作中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疏漏，從而也對方俗語詞考釋工作的準確性帶來嚴重的影響；敦煌文獻中的俗語詞研究要取得長足的進展，必須從俗字研究和文書校理入手。所以在俗語詞研究中，先生既汲取了前輩學者經常使用的歸納類比的訓釋方法，又善於把俗語詞研究和俗字辨識、文字校勘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如他考釋王梵志詩中的“蛆姑”一詞，便是從文字校勘入手，指出“蛆”即“怙”的假借字，而“姑”則即“妒”的俗體字，破除了字形的迷障，“蛆姑”的意義也就豁然開解了。

也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從 1987 年開始，先生和他的學生張涌泉、黃征合作，開始了“敦煌學三書”（即《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變文匯校》〔後改名《敦煌變文校注》〕、《敦煌吐魯番俗字典》）的撰著工作。“三書”的設想和寫作步驟大致是這樣的：在前人校勘的基礎上，通過核對敦煌寫本原卷，對《敦煌變文集》的失誤逐篇寫出補校論文，在刊物上公開發表，廣泛徵求意見，然後加以修改並系統化，形成《敦煌變文集校議》一書；在《敦煌變文集》的基礎上，增補其所未備，匯輯各家校說，並以己意加以按斷，形成集大成的《敦煌變文匯校》一書；廣泛調查搜集敦煌、吐魯番寫本中的俗字，並與傳世字書、碑刻等文獻中的俗字材料相印證，上討其源，下窮其變，勾勒出每個俗字的淵源流變，形成《敦煌吐魯番俗字典》一書。1989 年底，“三書”的第一種《敦煌變文集校議》大致定稿。該書依據敦煌寫本原卷，校正了《敦煌變文集》的大量校錄錯誤。以俗治俗，注重俗字、俗語詞之考釋，是該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先生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此稿專談我們自己的看法，自信不無發明，其中俗字和俗語詞的考釋方面，尤多獨得之秘。”確非自誇之語。可惜的是，“三書”的另二種尚未來得及進行，先生便齋志以歿了。

先生生前著有《訓詁叢稿》《訓詁學》等書。先生去世後，遵從

他的遺囑，我們完成并出版了《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變文校注》《敦煌俗字典》等書，并把他的遺稿整理結集為《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郭在貽敦煌學論集》《郭在貽文集》《新編訓詁叢稿》等，其中四卷本的《郭在貽文集》（中華書局 2002 年版）集其大成。除了這些付諸文字的論著之外，先生還培養了一批敦煌學、語言學人才。正如許嘉璐先生在《郭在貽文集》序中所說：“在姜亮夫、蔣禮鴻兩位先輩導夫先路之後，經在貽傳遞薪火，杭大——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學——在敦煌學、近代俗語詞和俗文字研究領域已成海內外重鎮。”先生開創的學術事業，正在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的手上不斷發揚光大！

唐代白話詩釋詞

這裏所說的唐代白話詩，包括收在《全唐詩》中的寒山詩、拾得詩以及收在《敦煌掇瑣》和《全唐詩外編》中的王梵志詩及不明作者的五言白話詩（按《外編》係節抄自《掇瑣》。又：這兩書中的五言白話詩，據考證實即王梵志詩）。這些詩中保存了數量不少的唐代口語詞彙，是研究漢語詞彙史的極可寶貴的材料。但是要對這些俗語詞作出解釋，是極不容易的，因為這些詞既不見於高文典冊，又未收進字典辭書，它們就像千古啞謎，等着我們去猜。“猜測”的辦法不外乎兩條：一是審辨字形。這些白話詩中使用了大量的俗別字和音近替代字，單從字面上看，往往莫名其妙，但是在找出它們所代表的本字和正字之後，便能渙然冰釋。二是比類綜合。即是把同一類型的語言材料搜集排列在一起，然後加以比較和推勘，這樣也往往能夠有所發現。下面所要解釋的十個詞，便是筆者對這一工作的初步而粗淺的嘗試。疏謬之處，敬請指正。

蛆姑

《全唐詩外編·五言白話詩》：“家中漸漸貧。良由慵懶婦。長頭愛床坐。飽喫沒婆肚。頻年慙生兒。不肯收家具。飲酒五夫敵。不解縫衫袴。事當好衣裳。得便走出去。不要男爲伴。心裏恒攀慕。東家能淫舌。西家好合□。兩家既不和。角眼相

蛆姑。別覓好時對。趁却莫交住^①。”(頁354—355)

按：“蛆姑”一詞不見於各種字典辭書，其義亦殊費解。考郭朋《壇經對勘》^②，惠昕本：“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疽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同是這一段話，契嵩本作：“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壇經對勘》頁46)又《壇經對勘》頁49惠昕本云“疽妒心，惡毒心”，頁50契嵩本作“嫉妒心，惡毒心”。兩本對勘，可證“疽妒心”即是“嫉妒心”，“疽妒”即是“嫉妒”。

再來看“疽妒”和“蛆姑”的關係：疽，蛆並從且得聲，例得通用(《廣韻》平聲魚韻“七余切”小韻內，收有疽和蛆，可見二字聲、韻全同)。姑是妒的俗別字，《增訂碑別字》卷四去聲七遇韻內：“姑，妒也。”姑的右偏旁舌，《康熙字典》引《正字通》之說，謂為昏字之訛；而昏字，《康熙字典》引《廣韻》，謂“亦書作舌”。由此可證，舌即是舌，姑即是姑，姑是妒的俗寫，則姑也即是妒的俗寫。

根據上述論證，可以得出如下公式：蛆姑＝疽妒＝嫉妒。

回頭再來看上引唐人白話詩：“兩家既不和，角眼相蛆姑。”此蛆姑正可以解作嫉妒。^③再從叶韻看：釋姑為妒，正好與上下文的肚、具、袴、去、慕、住等字相叶，均為遇攝字。

又：《敦煌掇瑣》三〇《五言白話詩》：“惣在糞屎中，不解相蛆姑。”此蛆姑也分明是嫉妒之意，意謂：“大家同處在穢濁的環境之中，還談得上誰嫉妒誰？”按：趙和平、鄧文寬兩同志在《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中注云：“蛆，《掇瑣》作蛆，意同。姑，音括，面醜也。”此注非是。第一，照這樣解釋，原詩無法講通。第二，音姑為括，則原詩失韻，原詩以數、瘡、戶、住、語、姑、具、處、去、土、墓等字相叶，姑字以外的字均屬遇攝，則姑字也應該屬遇攝，趙、鄧兩

同志讀妬爲拈，則屬山攝，顯與遇攝不叶。

又考《集韻》平聲魚韻“千余切”小韻內：“怛，妬也。”（同一小韻內又收有疽和蛆）《廣雅·釋言》：“妬，嬖也。”（按妬是妒的俗體）怛或嬖當即疽妒、蛆妬之疽、蛆的本字，疽妒、蛆妬均爲同義連文，疽和蛆如果讀以本字，都是妒義。

蛆儻

《全唐詩外編·王梵志詩》：“尋常慙念善。晝夜受書經。心裏無蛆儻。何愁仏（佛）不成。”又：“相交莫嫉妒。相勸莫蛆儻。一日無常去。王前罷手行。”（頁75）

按：“蛆儻”一詞費解。考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胆佞：千余反，謂胆妬也。下奴定反，諂媚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七《大集月藏分經》第二卷內亦收有“胆佞”一詞，所釋略同。）意思是說：胆有嫉妬義，佞有諂媚義。今謂蛆儻即是胆佞（蛆是胆的俗字，見《廣韻》平聲魚韻胆字注語，儻、佞雙聲，且同屬梗攝），其義謂嫉妬和諂媚（作嫉妬解的蛆字，其本字當爲怛或嬖，說見上文“蛆妬”條）。蓋嫉妒和諂媚，在佛家看來乃是妨礙人們修煉成佛的一種惡習邪念，如《壇經》云：“世人心邪，遇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讒佞侵害，自開衆生見。”（《壇經對勘》頁108）但是如能破除這種惡習邪念，則成佛也就不難，故梵志詩云：“心裏無蛆儻，何愁佛不成。”又“相交莫嫉妬，相勸莫蛆儻”的蛆儻，似應視爲偏義複詞——意思偏在儻（佞）字上，意謂相交莫要嫉妬，相勸莫要諂佞。

涇涇

《敦煌掇瑣》三一《五言白話詩》：“愚人癡涇涇，錐刺（刺）不轉動。身着好衣裳，有錢不解用。”趙和平、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注云：“涇：按字意，謂水直流也。疑此處用來形容其癡難改，不易回轉。”按：此注未為愜當，以“水直流”形容人之愚癡，殊覺不類。今謂涇涇當讀為愜愜，乃愜實貌，而愜實之義與愚癡之義是相通的，用今天的話說，猶言“死心眼兒”。《廣雅·釋訓》：“愜愜，誠也。”王念孫疏證：“《論語·泰伯篇》‘愜愜而不信’，包咸注云：‘愜愜，愜也。’《大戴禮·王言篇》云‘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愜女憧婦空空’，空與愜通。《論語·子罕篇》：‘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亦謂鄙夫以誠心來問也。故《釋文》云：‘空空，鄭或作愜愜。’”又《莊子·人間世》：“且德厚信_レ_レ，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釋文》引梁簡文帝注：“_レ，愜實兒。”按_レ亦當讀為愜。今謂涇作愜實解，亦猶空、_レ、愜之比，考其語源，均得義於空聲。

時對

《全唐詩外編·五言白話詩》：“家中漸漸貧。良由慵懶婦。長頭愛床坐。飽喫沒娑肚。頻年慙生兒。不肯收家具。飲酒五夫敵。不解縫衫袴。事當好衣裳。得便走出去。不要男為伴。心裏恒攀慕。東家能湮舌。西家好合_レ。兩家既不和。角眼相蛆姑。別覓好時對。趁却莫交往。”（頁354—355）

按：“時對”一詞費解。今謂時字當讀為特，唐代時、特二字通用，如元稹《連昌宮詞》：“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頭許燃燭。”日